

万家忠 少年入伍打天下 终生奋斗为人民



人物简介

万家忠,山东济南市长清区人,生于1932年4月。1940年加入抗日儿童团,1948年9月正式参加革命,历经支援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抵浙,参加了浙西剿匪战斗,同年12月入党。1953年从临安到舟山,曾任千礁区委书记、定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、临城公社第一任社长、普陀山区委(公社)党委书记、沈家门镇委副书记、市农林局工会主席。1992年离休,现为舟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、舟山市老干部摄影艺术研究会理事。现居住在定海昌国街道西安社区。

立功授奖情况:1949年4月在江苏省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七大队三中队,被授予一等功一次。1952年6月在临安军分区军邮支局被授予二等功一次,同年12月又被授予三等功一次。



万家忠参军时留影



万家忠与舟山、山东领导在普陀山合影



1962年与郭沫若等合影



1952年奖状

●从小参加抗日儿童团,站岗放哨练本领

1932年4月,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,我的亲生母亲在我一周岁时因病去世。我是在祖母和二婶的抚养下长大的。

因家里田地少,人口多,生活困难,在我五六岁刚懂事时,祖父将我父亲和几位叔叔都赶出家门,各自求生……

我从小就受到八路军的教育影响,记得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我家还住着八路军,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至今历历在目。

有一次,八路军官兵晚餐吃白馍,虽然每人数量很少,但有位战士还是将一半白馍分给了我吃。

我在6岁下半年入学读小学,7岁

和长成叔跟我父亲读《百家姓》,8岁跟万守箴爷爷拜孔夫子读私塾。也就是那一年冬天,日本鬼子进庄,把我家的桌椅拿到院子里当柴火烧掉。鬼子还到处搜捕八路军伤兵、抗日分子,杀人放火、无恶不作。

我9岁那年,堂叔万承良已加入共产党,回到本庄当教员,我和同村一些同龄孩子在他当教员的学校里上学,教的是八路军提供的油印教材,里面有不少革命的内容。从此我懂得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,誓死不当亡国奴成为自己幼小心灵的一个烙印。

因此,我于1940年秋参加了庄里的抗日儿童团,白天站岗放哨,晚上读

书识字,有时还学唱八路军歌曲。我们抗日儿童团站岗放哨可认真了,从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。有一次,一位货郎进村,向我们打听这打听那,我们就把他押到村里,首长表扬我们警惕性高,我们可高兴了。

在我10岁那年夏天,我们南院住着八路军战士,他们装备很差,子弹很少。那天,我和我二叔正在庄东的旱烟地里干活。上午9时多,只见骑着20多辆自行车的二鬼子(伪军)进了庄就与八路军打了起来,因八路军有群众的掩护,留在庄里的小股八路军与敌人打了一会,便转移到前下庄去了。可这次战斗也有两名八路军战士阵亡。此后,书

读不下去了,我只能为别人打短工。

1948年7月初,我经中共地下党安排到保里当地下通讯员,给党支部书记万家齐烧水、送信,还要应付外面来的人。

到了9月初,长清刚解放,我听见二叔在祖父的北屋里间说到要我参加区里工作,事后还送我一支绿色的日本式水笔,作为我参加革命工作的纪念。我祖母眯着老花眼,给我做了一套黑色的夹衣,让我穿上与党支部书记万家齐一块到了区里去报到。

我分配的新工作是跟财粮助理员,做支援我军攻打济南城的工作。此时,我算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。

●参加南下剿匪战斗,战地一线光荣入党

1949年初,为响应党中央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伟大号召,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,去完成接受江南解放区的任务。

当时我们二区抽调出6名干部南下。有区委书记李文东、区委组织委员孔繁佐、文教助理员董玉清、事务长张玉三、文书程衍琦和我。区里用一辆马车送我们到长清县城,住了一夜,第二天到肥城专署集中,路过家门口时,我四叔送给我一条灰色的毯子。

我们经泰安沿津浦铁路南下到山东临城刘村,被编为鲁中南区党委南下干部纵队七大队三中队。

1949年4月初,我们接到了支援前线的紧急命令,必须立即出发,急行军赶上部队。大家轻装出发,丢掉一切可不带的东西,当晚由徐州乘火车从东沿陇海路到新安镇下车,从此开始徒步千里行军。晓行夜宿,或晓宿夜行,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。经

宿迁、淮安、宝应、高邮、扬州、镇江、常州、苏州、湖州。5月5日,胜利到达杭州。

回想起来,千里行军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,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。每到一個宿营地,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洗脚,再用针把脚上的血泡穿破,涂上红药水。有的女同志累得饭也不想吃,倒头便睡。特别是北方人越往南方,水土不服,生活不习惯,又加上南方雨水多,气候潮湿,不少同志生了病。尽管如此,没有一人掉队,也没有一人叫苦。

杭州解放后,我们进山联合围剿。当时我们区干部和区武工队有17人,加上解放军的一个班共有27人,两挺机枪。前边有2位尖兵探路,紧接着是区干部和区武工队,再后面是解放军一个班。从小潘村出来翻过一个山岭,只见前面有20至30多头牛向下石阜村方向跑。

当我们来到了一个开阔地带时,埋伏在山岭上的土匪向我们袭击,火力很猛。我们听到枪响立即趴下,因我走在队伍稍后边,已没有田滕可以依靠,便向前跑到一条田滕下趴下,子弹如雨般打到我四周,溅起的泥土扬在我的脸上。因我们处不利地形,还击的火力不强。

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,作战经验丰富的王班长已带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绕到土匪的背后,猛烈开火,打得土匪措手不及,四散溃逃。这时原新四军的机枪排长申屠国有端起机枪大喊一声:“冲啊!”我们就冲了上去,在一个山岙里,抓到了5名土匪,其中有土匪副大队长。

这时战斗还未结束,前面还有敌情。解放军一位副班长使用的步枪枪管已打得火热,暂时不能再打了,急得他头上直冒汗。我见后,把自己正在使用的一支三八式步枪和20发子弹给

了他。

我押着两名土匪,边打边撤走到下石阜村一条溪坑旁。为了确保安全,我决定不停下来继续走路。一直步行了10多里路到了窄溪镇,太阳已落山了。摆渡到了梅蓉,公路不敢走,只走玉米地和小路,夜晚8时多才到桐庐县委吃饭。这时,我觉得一只脚钻心地痛,原来我脚上只穿了一只布鞋,另一只在冲上山时丢失了,数天后脚上的水泡都没退。

小潘这一仗,我们与200多名土匪交锋,打死了土匪大队长姚子达等3名敌人,活捉了土匪副大队长付元燮等5名敌人。我们仅两名同志负轻伤,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胜利捷报立即在全县传遍。

1949年12月10日,我在剿匪战地——桐庐县石阜区政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实现了我1948年9月参加革命时的夙愿。

●奔赴国防前哨,在普陀山一干就是11年

1953年3月,为了加强舟山的国防前哨建设,国家决定撤销距杭州政府比较近的临安地委、行署,建立舟山地委、行署,使原定海县升格。3月2日,我与300多位原临安地委、行署的同志一起到达舟山。

“苍糠搓绳起头难”,由于机构人员配备尚未落实,组织上将从临安过来的同志临时组成工作组,分赴各海岛开展工作。1953年4月到1955年4月,我在定海县委组织部任组织干事,还兼着县委机关党总支组织委员,后先后担任千礁区委书记、定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、临城公社第一任社长等职。

1961年10月底,我被调到普陀山任公社党委书记。上世纪60年代,为了促进岛上经济社会发展,1965年春天,我带领全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对全山进行了两天调研,走遍了全山角落,制订了不同区域种植毛竹、茶

树、杨梅果树等经济作物的发展规划。同时,公社党委决定在普陀山西北面人烟稀少的龙沙围海塘造地。这是一块落潮后露出一千多亩的荒凉海湾,事先我们公社领导在深入调查时,有少数老农民认为该海湾西北风相当厉害,围海塘极不容易,但极大多数干部群众对围海塘造地表现出强烈的兴趣。

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,有一天上午10时左右,恰巧是平潮,我带领公社全体党委班子成员,乘坐一条木帆船,到该海域测量水深,我们用一根绳子一头拴一块石头放入海中,经测围塘最外沿平潮时水深3.2米,基本符合建海塘条件,于是公社党委决定在该海湾围海塘造地,并给海塘取名为“战备塘”,1966年春节后破土动工。

此时,上级决定我们普陀山公社开展社教运动,公社一切工作必须按社教工作部署进行。我们一边抓革

命,一边促生产,革命生产两不误。通过社教,我们公社党委在渔农村一线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,扩充新鲜血液。

驻军对围塘造田很支持,王团长专门派出10多名班以上骨干参加里落潮塘口给予打眼放炮指导。

第二年春节过后没几天,天气还非常冷,我们就开工了。造这条海塘是我的决策,我会亲自与农民兄弟一起参加繁重体力劳动,500多公斤重的

小板车拉起就跑,干的活与一个壮力相仿。

1972年10月,普陀县委调我去沈家门镇工作,从此离开普陀山。当了11年普陀山公社党委书记,由此划上句号。



口述:万家忠
整理:翁盈昌 傅方达
采访时间:2021年2月24日
采访地点:沈家门街道大千社区傅方达红色收藏馆